阳光天使义工团看望老人。

10元（港币，下同）可以在香港干什么？买上一瓶矿泉水，或者搭乘一趟不过海的短程地铁。在物价高昂的香港，小小的10元显得用处有限。然而，这些毫不起眼的10元钱，或许是很多香港人首次在街头“买旗”、参与慈善的金额。我手交予你手，我心映照你心，一笔一笔积水成渊，凝聚成香港这座城市的慈善精神。

香港：公益故事满街巷

吴玉洁

在香港，全家大小换上义工制服，在繁华闹市卖旗筹款，或走街串巷慰问老弱，是再寻常不过的活动。这座700万人口的城市里，活跃着超过127万的注册义工，每年提供超过2400万小时的公益服务。乐于慈善的香港市民汇聚自己的举手之劳，将最朴素的“助人为乐”打造成这座城市最温暖动人的社会理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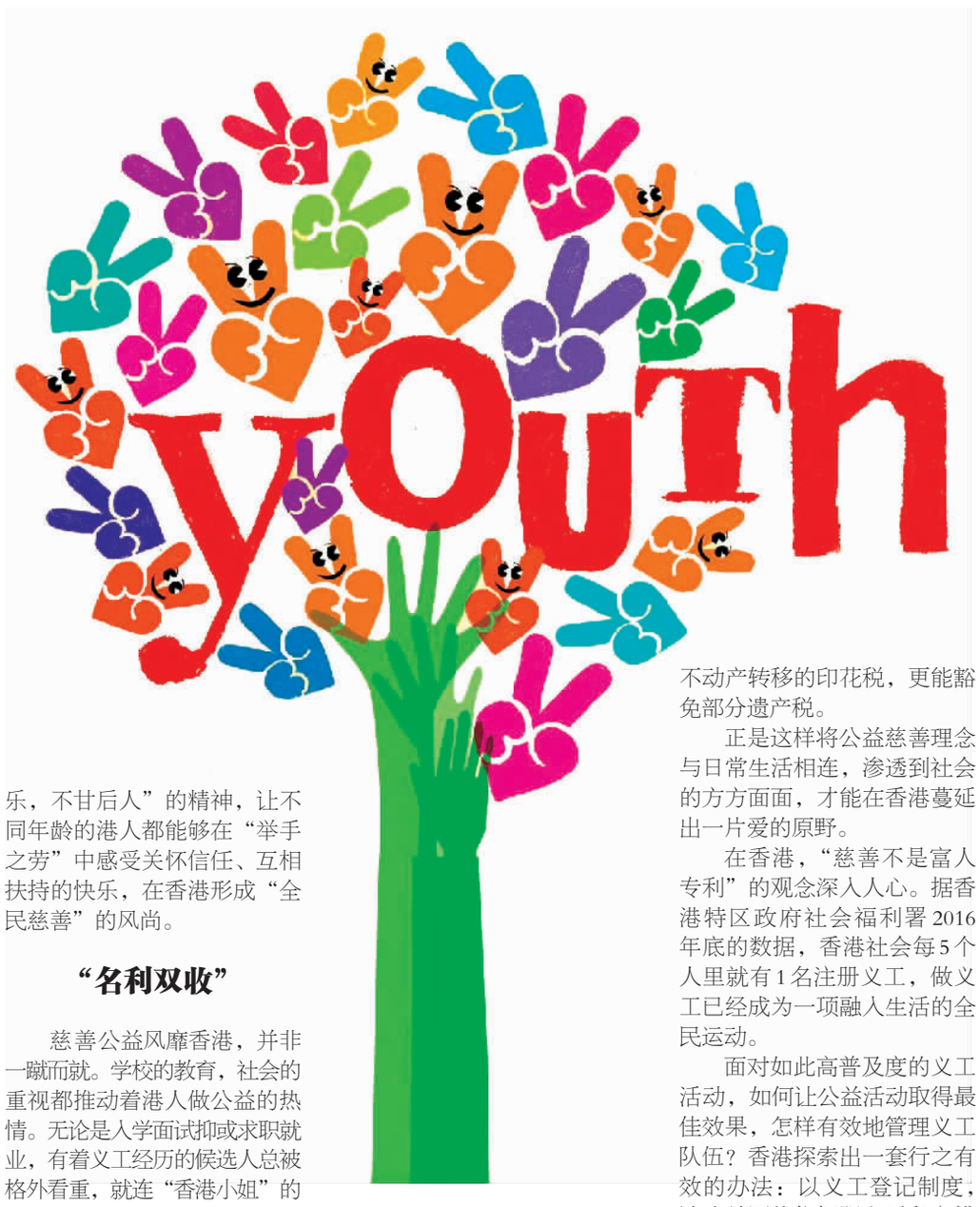
从“小”开始

“其实在香港，参与公益的意识正是从小处、从小时候开始培养的。很多香港人在读书期间都会被鼓励去参与一些义工活动，诸如卖旗筹款、看望长者之类。久而久之，做公益慢慢成为了一种习惯。”阳光天使义工团的发起人陈丹丹，也是这样走上了义工服务的道路。

“2016年初义工团成立以来，我们亲手制作传统食品看望独居老人，带领低收入的家庭进行亲子出游，为残障人士送去新春福袋。”回顾自己策划安排的近20次公益服务，陈丹丹感触良多。“公益活动让我和义工朋友了解到更多社会问题，学会珍惜现有的一切，也知道如何去关爱别人。”

截至2016年底，在香港提供或参与义工服务的慈善机构共有2927间，从街头捐款到定期助学、助老、助环保，还有诸如“渣打马拉松”等充满慈善元素的体育活动，覆盖几乎所有有需要的群体。

很多香港人一做义工就是一生。这些形式丰富的公益活动，向社会传递着“为善最乐，不甘后人”的精神，让不同年龄的港人都能够在“举手之劳”中感受关怀信任、互相扶持的快乐，在香港形成“全民慈善”的风尚。



“名利双收”

慈善公益风靡香港，并非一蹴而就。学校的教育，社会的重视都推动着港人做公益的热情。无论是入学面试抑或求职就业，有着义工经历的候选人总被格外看重，就连“香港小姐”的评比，都会把在公益慈善方面的贡献作为一项重要考察内容。

与此同时，香港《税务条例》规定，民众捐钱给认可的慈善机构和信托团体可以免税，最少只需捐满100元善款，多捐则多免。市民如果将不动产、遗产赠送做慈善用途，也不需要交纳不动产转移的印花税，更能豁免部分遗产税。

正是这样将公益慈善理念与日常生活相连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才能在香港蔓延出一片爱的原野。

在香港，“慈善不是富人专利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据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2016年底的数据，香港社会每5个人里就有1名注册义工，做义工已经成为一项融入生活的全民运动。

面对如此高普及度的义工活动，如何让公益活动取得最佳效果，怎样有效地管理义工队伍？香港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：以义工登记制度，让公益团体依据服务时段安排合适的义工参与活动；监督公益款项使用情况，不让爱心成为一笔“糊涂账”。

走入内地

如今，香港人的公益精神早已走出城市的界限，渗入祖国大地。内地数百所学校内高耸的“邵逸夫楼”，边远山区的港资希望小学，汶川灾后援建的100多亿元……让内地人民看到香港同胞集腋成裘的公益精神。

1997年7月1日开始运行的“健康快车”就是香港公益走进内地的最好写照。利用内地广阔的铁路网，通过在火车车厢内搭建简易眼科医院，深入边远地区免费医治群众的眼科疾病。20年间，“健康快车”走进过百个服务地区，让19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。

“快车首批运行费用正是来自香港的慈善捐款。”活动发起人方黄吉雯回忆说。不单是“健康快车”，香港的义工们早在30年前就开始进入内地，为内地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大量支持资金与资源。

“我们带去内地的不仅是医疗技术，更改变了内地公益慈善的理念。”方黄吉雯说，“2016年，国家出台了《慈善法》，相信内地的公益事业也能和香港一样发展得越来越好。”

在香港，公益精神流淌在生活里，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各义工组织和团体的合力下，港人每一份细小的热心都被妥善保存汇聚，积小善而成大爱，温暖着维港两岸，也滋润了华夏河山。

大图：香港社会福利署每年都会选出“香港杰出青年义工”，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。图为该计划海报。

八十封家书里的两岸情

陆华东

“国基学长如晤：家母在家乡多蒙兄照顾，此等恩德无以为报，返家后当登门面谢。”“家乡的凉绿豆汤店还开着吗？好想与兄再喝一碗，共忆童年时光。”这是一封1988年2月从台湾寄来的信，写信的是韩昌鸿，收信的是江苏苏州太仓人蔡国基。二人是发小。虽然早在1947年两人便分隔两岸，但兄弟情谊却从未被海峡阻断。

蔡国基今年86岁，韩昌鸿与他同龄。自1987年两岸打破隔绝状态、开展民间交流以来，两人已经先后通信80余封，最长的书信有十几页。在信中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家庭到社会，两位挚友无话不谈。

回忆起儿时与韩昌鸿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，蔡国基老人至今难以忘怀。1945年，两人小学毕业，蔡国基去外地学做生意。蔡国基每次回太仓老家都会用平时攒下的零钱买点小特产，带给韩昌鸿一起分享。而韩昌鸿每次也会请蔡国基到街上吃好吃的。

1947年，韩昌鸿跟随叔叔去了台湾，不久以后便在台湾参了军。稳定下来后，韩昌鸿从台湾给蔡国基写了第一封信。随后二人断断续续又通了四五封信。1949年后，受两岸关系影响，两位挚友渐渐失去了联系。

1951年，蔡国基也在大陆参了军。转业后，蔡国基回到家乡太仓县工作。每天上下班他都要从韩昌鸿家门口经过，跟韩昌鸿的父母打招呼，平时生活中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照顾两位老人。老人家渐渐地也把蔡国基当作亲儿子一般看待。“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，昌鸿的妈妈找到我，说她特别想儿子，我当时就承诺老人家有机会一定托人去找。”为了这份承诺，蔡国基到处打听，最后终于得到了韩昌鸿的消息。在蔡国基的帮助下，韩昌鸿母子二人终于在1989年见了面。

与此同时，两位好友的通信交流也逐渐恢复。由于韩昌鸿母亲不识字，蔡国基还经常替老人家代笔写信给在台湾的韩昌鸿，韩昌鸿给母亲的回信也都是蔡国基读给老人家听，并交由他保存。“老人家特别信任我，昌鸿也跟我无话不谈，我很乐意给他们母子当‘信使’。”蔡国基笑着说。

采访中，蔡国基老人翻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是1994年韩昌鸿写给他的信，信的内容足足有11页。虽然写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情，但是蔡国基老人每次都读得津津有味，并时不时在信纸上圈圈画画。每封信看完后，蔡国基都会轻轻地折好，装入信封，然后一封封码放整齐。“这些信记载了我们的往事，是我们友谊的见证，我要一直保存下去。”蔡国基说。

蔡国基在家中整理韩昌鸿寄自台湾的信件。　钟升 摄

行摄香江

观　海

近日，位于香港海港城海运大厦新扩建顶层的观景台——“海运观点”向市民、游客开放。“海运观点”观景台临海向西，可以270度观看维多利亚港景色，眺望香港岛及九龙半岛两岸美景。

上图：一名游客在“海运观点”观景台上拍照。

左图：从“海运观点”观景台看维港景色。

新华社记者 **卢炳辉** 摄

因少子化的影响，台湾正迈入老龄化社会。建构成一个人人可以安心变老的长照（长期照护）社会，就成了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。对此岛内各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

台湾养老面面观

王大可

种出“幸福感”

台湾新北市五股狮子头公共托老中心里，许多长辈亲手栽种蔬果，再采摘来自己吃，体验开心农场乐趣，也重新回味田园生活的美好回忆。

与此类似，台湾桃园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在园区内开垦出一片占地15公顷的绿色农场，并出租给老人耕种。

养生文化村副主任倪同芳表示，绿色农场里，有的区域栽种了各种水果，老人可以随时来观果与采果；有的区域则向老人提供栽种、耕作服务，以此活动筋骨。这不仅保障了食品安全，也让老人享受到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乐趣。“在农场内，老人不再是被动式养老，而是主动生活，用自己的劳动种出‘幸福感’。”

五股狮子头托老中心里，长辈在采摘亲手栽种的有机蔬菜。（**资料图片**）

乐忆旧时光

在台北至善老人安养护中心，95岁高龄的倪王应觉老太太每日午后都会约上三五个“老友”，到“怀旧隅”小聚。这一刻，老人们笑得特别开心。

几十平方米的天地，却宛如时光隧道，让人一下子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屋内，斗笠、老式电话、旧梳妆台、黑白电视等老物件一应俱全，墙上挂着镶了黑白照片的老相框以及一件老式挂钟，指针慢悠悠地旋转着，仿佛时光从未离开……

“这是一种怀旧疗法，通过将老人带回过去的美好时光，帮助其平静心情，减少患老年痴呆症的概率。”至善老人安养护中心的承办单位耕莘医院院长邓世雄表示。

学习“第二春”

“没想到退休后竟然比上班还忙，每周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。”62岁的张阿公住进新北市双连安养中心后，不仅报名参加了合唱班，还兼职当起书画老师。

双连安养中心是一家私立养老机构，其最大特色在于设有一所老年大学——双连松年大学。目前，共设有书画、才艺、音乐、语言和心灵成长五个班级，学员平均年龄82岁，各类课程更是多达54种。

双连安养中心主任赖明妙表示，在老年大学里，老人们相互学习借鉴交朋友，让晚年生活不再孤单，找到生命的“第二春”。

有人说，养老服务在做好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，更要关注老年人内心的需求和感受。不妨像台湾那样，从细节入手，在配套服务上多点创意、多些温情，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精彩绽放。